论十八世纪中英通使的礼节冲突

刘 凤 云

在十八世纪，以马戛尔尼为首的英国使团访问清朝政府，可谓中英关系史上一次最具影响的外交活动。它是两国之间通使往来的开端，中英双方的外交政策、外交目的及其意图，都在这次活动中得到充分的反映。同时，它预示着中国将不可避免的被卷入世界资本主义的洪流，中国传统的封建政治面临着外来势力的撞击和挑战。然而，由于中英两国政治、经济结构的截然不同，两国政府各有不同的追求目标，他们为了维护本国的社会制度和历史传统，站在各自的立场上采取了互不相让的抗争态度。因此，在这次外交活动中，反映两种体制、两种文化的矛盾冲突便不可避免地爆发了，并由此导致了这次外交接触的失败，清朝政府由此失去了一次了解西方的机遇。而值得注意的是，在这场矛盾冲突中，觐见中国皇帝礼节则成为一个焦点。

一

1793 年(乾隆五十八年)7 月 25 日，马戛尔尼率领着由正式成员、士兵、水手及工役人员组成的七百余人的庞大访华使团，在历经十个月的艰苦航行后到达大沽口岸。由于马戛尔尼使团以庆祝乾隆帝八十大寿为名而来，清朝政府规定了欢迎和优恤的接待方针，乾隆帝命长芦盐政徵瑞作为钦差大臣前往大沽迎接，直隶总督梁肯堂由保定至天津接待。然而，还未等这次外交接触开始，礼节问题便已成为矛盾冲突的隐患。当徵瑞抵大沽后，听说英使欲以平行礼节与清朝官员相见，即决定自己不出面，而委派天津道乔人杰、通州副将王文雄为代表前往。随后，上奏乾隆皇帝说："查外藩使臣与奴才等相见仪注、向例总待以陪臣之礼。奴才拟赴该船时先告之仪注，该正贡使马戛尔尼、副贡使助阿那尔乐斯自以品级尊崇，须平行相见。奴才窃思，英吉利国原非安南、缅甸之比，其贡使稍示优礼，未为不可，但彼既以品级自居，奴才先行往见，有失国体，是以即令门出海口之天津道乔人杰、通州副将王文雄过彼船内。"①

徵瑞作为钦差大臣代表清朝政府接待英国使团，他在礼节问题上的敏感及其所持的抗争态度，是很有代表性的。它预兆着这场礼节冲突即将开始。

8 月 14 日，当使团的船队自大沽经由天津、已迫近通州时，乾隆皇帝就英使觐见礼节向徵瑞等作出详细指示。他说："前据梁肯堂奏，与该使臣初次相见、敬宣恩旨时，该使臣免冠竦立，此次摺内何以又称免冠叩首？向闻西洋人用布扎腿，跪拜不便，是其国俗不知叩首之礼，或只系免冠鞠躬点首，而该督等折内声叙未能明析，遂指为叩首，亦未可定。著传谕徵端，如该使臣于筵宴时实在叩首则已，如仍止免冠点首，则当于无意闲谈时婉辞告知，以各处藩封到天朝进贡觐光者，不特陪臣俱行三跪九叩首之礼，即国王亲自来朝者亦同此礼。今尔国王遣尔等前来祝嘏，自应遵天朝法度。虽尔国俗俱用布扎缚，不能跪拜，但尔叩见时何仿暂时松解，俟行礼后再行扎缚，亦属甚便。若尔等拘泥国俗，不行此礼，转失尔国王遣尔航海远来祝厘纳贡之诚，且贻各藩部使臣讥笑，恐在朝引礼大臣亦不容也"。②可见，乾隆皇帝在礼节问题

上，不仅与他的大臣们有着同样的敏感，且固执于“天朝法度”。

8 月 15 日，徵瑞奉命拜访美使，按照乾隆皇帝的指示，告知觐见礼节及日程安排，然后奏报朝廷。据 8 月 18 日乾隆上谕说：“徵瑞奏，英吉利使臣等，深以不娴天朝礼节为愧，连日学习，渐能跪叩，徵瑞随时教导，俾臻妥善等语”。[3]似乎英国使臣已经接受了清朝的叩首礼。但从后来的情况看，徵瑞在这里显然作了谎报。当时，马戛尔尼正在寻找妥善解决这一问题的办法，既不招致中国方面的反对、被勒令回国，又不使自己的行为有失体统、有辱英国国威。所以，对徵瑞所提行叩首礼未作公开反对。于是，急于邀功的“钦差大人开始强迫特使在他面前向御座作这个礼。”“他除了自己出马而外，还通过经常和特使有接触的中国官员从旁劝说”。“他们假装认为特使已经同意行磕头礼，他们对特使说，为了避免不习惯，临时失仪，最好预先作充分演习。”[4]足见徵瑞等人确实作了相当的努力，但并未达到目的。

8 月 25 日，英国使团抵达北京之后，徵瑞再次向马戛尔尼提出演习叩头礼仪的要求。这时马戛尔尼已经考虑成熟，他表示他已起草了一份有关此问题的信件。几天以后，他便将这份译成四种文字的信件交给徵瑞，并请徵瑞转交当朝要臣和珅。马戛尔尼在信中说：“为了避免失仪，和向尊严伟大的皇帝陛下表达地球上最远和最大国家之一的崇高敬意，本特使准备执行贵国臣民和贵国属地君主谒见贵国皇帝陛下时所行的一切礼节。本使准备在下述条件下这样做：贵国皇帝钦派一位同本使地位身份相同的大员穿着朝服在英王陛下御像前行本使在贵国皇帝面前所行的同样礼节。”[5]徵瑞答应立即转达，随行官员乔人杰、王文雄等亦认为这不失为权宜之计。

然而，问题并没有解决，礼仪之争自天津，经北京，又继续到热河。9 月 8 日，当英国使团进入热河之后，徵瑞即把那封信退还给马戛尔尼，乔人杰、王文雄也奉和珅之命前来告知使团说：“不能考虑英国的独立身份，特使谒见皇帝必须行属国使臣礼节。……特使必须无条件地向皇帝行叩头礼。”[6]至此，中英双方在觐见礼节上的矛盾冲突已经表面化和明朗化。马戛尔尼顾虑到英国使团可能会因此被驱逐回国，急于向清朝政府表明他在这一问题上的积极态度，便派他的秘书、使团副使斯当东前往和珅官邸，直接将那封有关礼节问题的信件交给和珅，并据以陈说。这次交涉，仍然没有结果。和珅不同意马戛尔尼信上的建议，他要求英使以其他更合适的方式执行中国朝廷的礼节。在斯当东的再三请求下，才勉强表示容他再作考虑。[7]

和珅作为乾隆皇帝宠臣，官居大学士，他的态度在一定程度上是能够影响皇帝本人的。

随着乾隆帝万寿吉日的迫近，英国使臣以何种礼仪觐见中国皇帝已成为当务之急，徵瑞等人不得不奏明真相。乾隆闻讯，顿时勃然动怒。9 月 9 日颁旨说：“英吉利使臣等前来热河，于礼节多未谙悉，朕心深为不惬。”[8]当日，徵瑞即携乔人杰、王文雄二人到英使舍馆，奉旨催促马戛尔尼改变态度。马戛尔尼正等待和珅对其建议有所考虑，并抱以希望，所以再次拒绝徵瑞的要求。次日，乾隆皇帝的口气更加严厉，他说：“该使臣到热河后，迁延装病观望，许多不知礼节。……现令演习仪节，尚在托病迁延，似此妄自骄矜，朕意深为不惬。”[9]于是，徵瑞与乔、王再次来到英使居第，劝令马戛尔尼改行中国礼节，言辞颇为强硬。在双方关系就要破裂的情况下，马戛尔尼仍然坚持：“或者双方行对等礼，或者必须使独立国使节和属国代表的谒见礼节有所区别。”并且说：“他谒见英王陛下是行单腿下跪的礼节，他准备以同样的礼节见中国皇帝。”[10]

为了解决礼节问题的矛盾，9 月 11 日和珅代表清政府与马戛尔尼进行了最后一次磋商。9

月 14 日，觐见仪式在避暑山庄万树园成礼。据英人记载，经过这次磋商，清朝政府同意了英使以英国礼节见乾隆皇帝，在觐见时，马戛尔尼等人是单膝跪地，未曾叩头。[11]而在和珅的奏折中却说："臣和珅同礼部堂官率钦天监监副索德超带领英吉利国正副使臣等恭递表文，……臣等即令该贡使等向上行三跪九叩头礼毕。"[12]

由于双方记载的不同，已很难明其真相。但无论当时以何种形式解决这场矛盾冲突，都改变不了礼节争执对中英首次通使往来所造成的影响。

二

礼节问题，只不过是个形式问题。但在当时，却几乎酿成无法解决的矛盾冲突，使双方关系一度陷入了僵局，并由此导致了这次外交活动的失败。

首先，乾隆皇帝因礼节争执的不快，一改先时体恤优礼的接待方针，降低接待规格。对于马戛尔尼使团访华，清朝政府最初是持欢迎态度的，并表现出前所未有的重视。乾隆帝声称："今英吉利国差人进京具表纳贡，系属好事。"[13]为此，他连下数道谕旨，不仅破例允许使团由天津上岸，命令沿海各省地方官做好接待工作，而且免费向使团提供一切供给。"大量丰富的日用品不但供应到全体船员，而且普遍供应到使节团的所有技匠、卫队和仆人。"一个使团成员极其满意地写道："关于这一方面我们所受的待遇不仅是优渥的，而且是慷慨到极点。"[14]

然而，当乾隆皇帝获息马戛尔尼等人不愿执行中国的礼节之后，他对使团的热情立刻变成了恼怒，于 9 月 9 日、10 日连续发布上谕说："伊等前此进京，经过沿途，地方官款接供给，未免过于优待，以致该贡使妄自骄矜。将来伊等回国，……只须照例应付，不得踵事增华，徒滋繁费。此等无知外夷，亦不值加以优礼。"[15]"似此狂妄骄矜，朕意深不为惬。已令减其供给，所有格外赏赐，此间不复颁给。京中伎剧，亦不预备。……外夷入觐，如果诚心恭顺，必加以恩待，用示怀柔。若稍涉骄矜，则是伊无福承受恩典，亦即减其接待之礼，以示体制，此驾驭外藩之道宜然。"[16]于是，由于乾隆态度的转变，清朝政府对使团"从来是供应丰富的桌面，现在(9 月 10 日午餐)却不够供给一半人数所需取食的数量。"[17]这就是乾隆所说，因英使"未谙礼制，不得不稍加裁抑"的实施。

其次，由于马戛尔尼固执英国礼节，乾隆帝断然拒绝了英使留驻北京的请求，使中英失去了一次早期建交的机遇。自 9 月 11 日，双方就礼节问题达成协议后，乾隆皇帝的情绪已经恢复正常，并在万树园两次接见马戛尔尼，依例给予赏赐。但到 9 月 23 日，他从英王的表文中得知，英国有派人留京居住的请求后，对英使的态度重又严厉起来。他立即颁布上谕，明确反对英使驻京，理由之一即是英人不肯遵从中国的礼法。他说："现在译出英吉利国表文内，有恳请派人留京居住一节，虽以照料买卖、学习教化为辞，但伊等贸易远在澳门，岂能照料。至于天朝礼法与该国风俗迥不相同，即使留人观习，伊亦岂能效法。且向来西洋人，唯有情愿来京当差者方准留京，遵用天朝服饰，安置堂内，永远不准回国。今伊等既不能如此，异言异服，逗留京城，或其心怀窥测，其事断不可行""伊等如妄有干请，即当辞严义正，严加驳斥，不可过事优容，致启其冒渎无厌也。"[18]

乾隆的这次上谕，除了反映他对国际建交的正常往来的无知外，还不难看出，礼节之争，使他对英人"输诚向化"的诚意及其来华的目的发生了怀疑，并由此产生了成见，已视英国为"化外"之邦。而后，他在给英王的复信中又重申了这一观点。他说："天朝自有天朝礼法，与尔

国各不相同。”“尔国自有风俗制度，亦断不能效法中国。”[19]以派人留京，与“天朝体制不合”，礼法不合，拒绝了与英国建交。

清朝政府固守所谓“天朝体制”，无意于对外联络交往，是其长期以来所奉行的闭关政策的结果，而英人在礼节上的固执，无疑坚定了封建朝廷对其既定国策的执行。

第三，礼节冲突，是双方未能认真谈判的一个重要因素。

英国使团自踏上中国版图伊始便遇到了礼节问题，而由此所产生的争执，伴随使团自大沽奔往热河的整个行程，耗费了长达四十余天的时间，使使团在与清朝政府的最高阶层接触前，先已失去了许多间接交涉的机会。9 月 8 日，英国使团进入热河镇后，又为礼节争执的解决，僵持了整整六天。大量的时间和精力都用于礼节的争议，不仅使清朝政府对英国使团的访华由兴奋之致变得兴趣索然，而且产生了喧宾夺主的不良后果，两国之间的正式交谈似被置于无足轻重的地位。

9 月 14 日，马戛尔尼觐见乾隆皇帝的仪式结束后，使团在热河又逗留了一个星期，9 月 21 日启程赴北京。在这期间，避署山庄上上下下都在忙于乾隆皇帝万寿节的筹备工作，中国方面未作任何会谈的安排。但马戛尔尼并没有忘记他的外交使命，他时刻寻找与清朝政府谈判的机会。9 月 17 日，当为乾隆帝祝寿的仪式结束后，马戛尔尼便向陪同他游览避署山庄的和珅等四位大臣就英使来华的目的发表谈话，试图将话题转到中英外交事务的商谈上来。但都被和珅巧妙地回避了。和珅推托说：回到北京以后，“可时时与特使相见，讨论一些重大问题。”

马戛尔尼认识到在热河与清朝政府谈判已经无望，便于 9 月 18 日给乾隆写了一封信，企图通过文字表明他此行的意图，打动中国皇帝。他在信中请求清政府，允许马金托什船长返回舟山，允许“印度斯坦”号在舟山贸易，使团在京期间派一位传教士担任翻译，并允许随使团前来的两位澳门传教士能到北京为朝廷服务等等。

对于此信，乾隆帝很快给予了答复。虽然，他没有答应马金托什可返回舟山，并命令浙江巡抚在舟山催令护送船只尽快回国，但却同意了英国船只可在浙江省购买茶叶等物，允许外国传教士来京当差，还作出了英人购买货物“免其纳税”的规定。[20]尽管这种优礼是基于清朝政府“以德化夷”的对外政策，却表明中英双方就某些外交事务的会谈并非不可能。但是，如前所述，当乾隆帝从英王的表文中获悉英国有派人留京的要求后，态度又急转直下，而礼节争执则是其中诸多原因之一。它不仅成为双方建交的障碍，也影响到在京的谈判。

马戛尔尼由热河返抵北京后，便从清朝官员的暗示中察觉到中国方面的变化，并从传教士那里证实了清廷有要他赶快回国的意思，便写信给和珅，要求立即会谈。

10 月 2 日，双方在圆明圆正式会晤，马戛尔尼再申英王的主张，向清朝政府明确提出了两国互派使臣、建立外交关系的建议。他说：“英国国王此次派使节团前来，拟令我久驻北京，藉以永远敦睦两国友谊。鉴此，今后我们在北京所用的一切费用，可以椤由英国开发，不必再由中国供给。倘中国有与英国互派使臣之意，尤为英国政府所欢迎。所有船只一切及到英国以后的种种供应，英国可完全负责。”[21]随后，又提出扩大贸易等项要求。

尽管马戛尔尼非常委婉地将准备谈判的几个问题概括地点了出来，但和珅却是一副不理不睬、置若罔闻的样子，态度较在热河时冷淡得多。他对马戛尔尼提出的问题一字不答，所谈的内容只有一个，即是催促英使赶快回国。这唯一进行的一次谈判仍然没有任何结果。

10 月 3 日，马戛尔尼在太和殿接到了由和珅转达的乾隆皇帝致英王的复信和礼物。他再

次提出请和珅考虑前一天讨论的外交和贸易的有关问题。但和珅还是没有任何支持态度，仅仅同意特使写个书面意见来，由他考虑。事实上，这只不过是个托辞，乾隆皇帝在给英王的复信中已经坚决回绝了英国提出的建交要求，声称："此则与天朝体制不合，断不可行。""况西洋诸国甚多，……岂能因尔国王一人之请，以致更改天朝百余年法度。"明确"遣令贡使等安程回国。"

马戛尔尼感到了事态的严重，不仅谈判不再可能，而且使团在京也住不了几天。于是，他立即起草了一封信，派人当日送交和珅，并表示他在收到中国方面的复信后，立即带团回国。

在这封信中，马戛尔尼向清朝政府提出了六项要求：[24]

1、请中国允许英国商船在舟山、宁波、天津等处登岸贸易。

2、请中国按照从前俄罗斯商人在中国通商之例，允许英国商人在北京设一货栈，买卖货物。

3、请于舟山附近划一未经设防之小岛给英国商人使用，以便英国商船到彼停泊，存放货物，且可居住商人。

4、请于广州附近得到上述同样的权利，且任英国人自由往来，不再禁止。

5、凡英国货物，经由澳门运往广州者，请优待免税或从宽减税。

6、英国船货按照中国所定之税率交税，不额外加征，并将所定税率公布，以便遵行。

针对上述六条，乾隆帝二次复信英王，逐一驳回了马戛尔尼的所有外交要求，并十分严厉地表示："若经此次详谕后，尔国王或误听臣下之言，任从商夷将货船驶至浙江、天津地方，欲求上岸贸易。天朝法制森严，各处守土文武恪遵功令，尔国船只到彼，该处文武必不肯令其停留，定当立时驱逐出洋。"[25]

总之，马戛尔尼使团访华，没能获得一次与清朝政府谈判的机会，被迫所实行的文字洽谈，最终以乾隆不改变广州一口通商政策，并以强硬的态度告诫英国政府不得"妄有干求"而告失败。

十八世纪的英国政府，为适应本国资本主义的迅速发展，企图加强中英两国政治上的依赖关系，以适应其资本主义经济寻找商品市场和对外扩张的迫切需要。马戛尔尼使团一行是肩负着打开中国大门的历史使命的，他的要求自然带有侵略的性质，诸如割取舟山、广州附近的岛屿等。但当时的英国尚不具备使用暴力将自己的意志强加给中国的实力，其扩大经济利益的要求则完全使用的是和平谈判的手段。在这种情况下，乾隆皇帝抱残守缺，固执于封建地主阶级的保守主义和封闭政策，拒绝同英国使臣进行认真的谈判，显然是不明智的。从表面上看，这是英国人的失败，但实际上，中国人却失去了一次尽早了解世界的机遇。问题没能用和平的方式得到解决，却由鸦片战争打开中国的大门。

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在既定的历史条件下，人们不能随便地选择对外政策。乾隆皇帝对英国使团的态度，及其由此形成的结局，从根本上说，是中国传统的政治经济结构的产物。建立在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基础之上的清政府，长期以来处于与世隔绝的状态，对外部世界既无需求又无了解，因而妄自尊大地拒绝交往，拒绝谈判。这是它酿成历史悲剧的必然性。但是，在历史的必然性中，不容否认的是，觐见皇帝礼节的争执，不仅是这次中英通使整个冲突的开端，并加剧了矛盾的激化，成为导致外交失败的原因之一。

三

一个国家的礼节，属于其对外政策的组成部分，而对外政策是人们主观意念的产物，它依赖于该国的社会制度和经济基础，也依赖于该国历史上所形成的文化传统。

中国是一个历史悠久的文明古国，文化传统渊源流长，文化的自身肌体亦相当健全。然而，由于其文化体系建立在封建关系和自然经济基础上，因而到了十八世纪，随着世界的巨大变化，其封建性与保守性便愈益暴露出来。

众所周知，在以儒家文化为主体的中国传统文化中，所谓“礼”具有突出的地位。中国向有“礼仪之邦”的美称，“自虞廷修五礼，兵休刑错，天科虽减，鸿仪实容，沿及汉唐，讫乎有明，救敝兴雅，咸依为的。”[24]正如古代思想家荀子所说：“礼者，治辩之极也，强固之本也。”“人命在天，国之命在礼。”礼，成为中国古代社会政治制度、等级制度、社会意识、伦理道德的总称，它规范着社会的统治秩序及人们的价值观念、行为方式和心理心态，像一条准绳一样横贯于天子百姓之间。”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已成为阶级社会中人们思想中的信条和准则，同时也成为中国人的文化心理，渗透到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整个社会，上至国君确立与巩固权力地位，下至百姓间的人际交往、婚丧嫁娶、衣食住行，都有礼仪可循。“不学礼，无以自立”的传统教育方式和对礼的学习与培养，不仅促成了以礼为基本内容之一的传统文化的延续，而且使中国人也成了被礼规范化、模式化了的人。

在阶级社会中，统治阶级制定礼仪的主要目的，在于确立自君主至平民所形成的层层垒积的尊卑等级关系，从而树立君主的绝对权威。即所谓“礼义以为纪，以正君臣，以笃父子，以睦兄弟，以和夫妇。”[25]而在所有的礼仪中，自周秦以来所形成的跪拜礼，则是对君主至高无上的地位的承认和服从，它是古代中国使用年代最长，最频繁的一种礼节。《周礼》曰：“因跪而益至其恭，以头著地为拜。”在中国，臣民匍匐于君主脚下，向号称天子的皇帝行跪拜礼被视为天经地义。这种在强固的小农经济基础上所形成和积淀起来的上下尊卑的传统观念和文化心理，在中国两千余年的封建社会中已是根深蒂固。正因如此，再加上对世界的无知，必然导致了他们会自觉不自觉地将这种观念和文化强加给所有与他们交往的外国人。如英国使臣在访华的过程所体验到的那样：“他们（中国人）认为外国和外国人同他们的皇帝的关系，同他们没有什么分别”，所以，“这种磕头礼节，除了本国和属国臣民而外，并且要求所有外国使臣都照样做。”[26]了解了这一点，就不难理解乾隆皇帝为英使不肯行叩拜礼，大动肝火，两次颁上谕表示“朕心深为不惬”，而清朝官员“在这件事情上（礼节）确下了不少功夫”的原因了。

然而，由于文化的差异，英国人对中国的礼节，和中国人对礼节的重视，以及君主至上的思想，都甚感不解。使团副使斯当东在他的访华回忆录中这样写道：当使团到达天津后，“总督（梁肯堂）引导特使（马戛尔尼）通过大厅至顶端一个阴暗深处，据云那里代表皇帝陛下御座，必须对之行礼。虽然这是一个非常奇怪的要求，而特使也不得不对之鞠了一个深躬。”

以使臣的身份向中国皇帝的御座鞠躬，毕竟不失本国体面，无碍大局。何况，为了保证外交使命的完成，马戛尔尼要求他的全体成员，“必须谨言慎行，用实际表现来改变他们（中国人）的成见，争取他们的好感。”而且“决定在不损伤自己国王的尊严的前提下，尽力满足中国皇帝的要求。”[27]但是，到了要行在英国人看来属于世界上最能“表示行礼者的恭顺卑贱和受之者的神圣崇高”的叩头礼时，他们便开始为西方第一强国的尊严感到不平了。于是，通过礼节

争执所表现出来的两种文化的矛盾冲突，便以中英双方为维护本国利益站在各自立场上互不相让的外交冲突形式爆发了。这是其一。

其二，古代中国在创造了自己高度的物质文明的同时，也创造了文化中心论的思想。即传统的中国文化，视古代华夏族生活的黄河流域为世界的中央，视周围四方的外族人为蛮夷，“是以声名洋溢乎中国，施及蛮貊。”[28]这种思想观念影响着历代的统治者和他的臣民们。到了清代，“天朝上国”居于世界中心的文化意识，依然居于统治地位，在朝廷主持纂修的《清朝文献通考》中记载说：“中土居大地之中，瀛海四环。其缘边宾海而居者，是谓之裔；海外诸国亦谓之裔。”

不难看出，这是一个以自我为中心，按照远近亲疏关系、地理位置确立的囊括世界体系的等级制度，名份与尊卑一揽其中。依据这种划分，中国无疑处于至尊的地位，而一切外国则都成了中国的“属国”，不仅周国的小国，即便是单纯前来通商的国家，也一无例外。这就是所谓“天朝统驭万国，抚育四夷”的思想基础。基于这种以自我为中心的文化思想，中国人产生了高度的优越感，而这种优越感的盲目性，便形成了对外交往的狭隘认识。即古代中国把世界各国均纳入对自己称臣朝贡的行列，并以此判明亲疏。为此，历朝历代的统治者都制定了一套繁复的朝贡礼仪，朝贡国必须严格遵行这些礼仪，才能表明其“向化”的诚意，而中央王朝高居于“四夷”和“众番”之上的尊严和威德，也在这些礼仪中显示出来。

清王朝继承了古代中国的灿烂文明，也继承了传统文化的因循保守。当英国使团已经濒临中国海疆的消息盈廷传扬之时，清朝政府才在地图上找到了英国的方位，并由此确定了英国的“外夷”的名份和地位，以致于不加思索地称马戛尔尼为“贡使”，称他们带来的礼品为“贡品”。在中国人的观念和既往的历史经验中，马戛尔尼使团访华，除为了乾隆皇帝祝寿、进贡，除了为仰慕中国的文明表示恭顺外，不可以有任何其它的目的。而作为朝贡国，他们必须一体遵从中国礼制，朝贡完毕，也就完成了使团此行的任务，所有其它的要求都成了“非分干求”。

传统文化的封闭性、内向性，决定了清朝政府在对外政策上的短线认识和愚昧无知，他们把国际之间的正常贸易往来，看成是“加惠远人，抚育四夷之道”。乾隆说：“天朝物产丰盈，无所不有，原不籍外夷货物以通有无，特因天朝所产茶叶、瓷器、丝斤为西洋各国及尔国必需之物，是以加恩体恤。”[29]这种小农经济的思想体系，再加上自我为中心、夜郎自大的文化心理，构成了清王朝实行闭关锁国政策的必然因素。

此外，我们还应该看到，闭关自守的经济政策和传统文化的排外偏见又是成正比的。在这一方面，由于“中国的大臣们比皇帝本人更坚持中国居于其他国家之上的这种过时的陈旧的观点”。他们不仅“认为皇帝的统治普及全世界”，而且存在严重的排外心理。如这次奉命接待英使的大臣徵端，在英国人的眼里，“这位钦差充分暴露出他刚愎的个性”，“他的态度处处暴露出忌妒外人，蔑视外人的心理。”[30]而像徵瑞这样的清朝官员，还有和珅、福康安，以及先后主持对外贸易的李侍尧、新柱、杨廷璋、杨应琚等人。他们都有同样的思想意识，同样的文化心理，并从不同的方面给予乾隆皇帝以影响。也就是说，作为统治者，他除了直接地继承传统文化之外，还要受到旁及的、周围的各种思想的影响，并以自己的思想影响着千千万万的民众。从而形成了传统文化对外来事物的强大的抗拒力。

①⑬档案《乾隆朱批奏折、外交类》。

②③⑨⑯⑲《掌故丛编》英使马戛尔尼来聘案，31 页；41 页；53 页；53 页；67 页。

④⑤⑥⑦⑩㉑㉖㉗㉚（英）斯当东《英使谒见乾隆纪实》，319－321 页；325 页；357 页；355 页；359 页；408 页；318－319 页；321 页；273 页。

⑧⑮⑱⑳㉓㉙卷 1434－卷 1435。

⑪（英）斯当东《英使谒见乾隆纪实》，361 页；萧一山《清代通史》801－820 页载：刘复译《乾隆英使觐见记》。关于觐见礼节问题，笔者倾向于英人的记载。

⑫《乾隆五十八年英吉利入贡始末》。

⑭（英）斯当东《英使谒见乾隆纪实》，264 页；（英）安德逊《英使访华录》，126 页。

⑰（英）安德逊《英使访华录》126 页。

㉒秦仲和《英使谒见乾隆纪实》231 页。

㉔《清史稿》卷 82。

㉕《礼记、礼运》。

㉘《中庸章句》，第 31 章。

* * * * * * * * *

（上接第 26 页）

㉓㉔；㉖；㉙；㊾；㊿ 故宫博物院掌故部编：《掌故丛编》，中华书局 1990 年版，第 727 页；729 页；730 页；752 页；616 页。

㉗《清实录（乾隆朝）》，第 21334－21335 页。

㊻见秦仲龢译：《英使谒见乾隆纪实》第 81－82 页，叶笃义译《英使谒见乾隆纪实》第 322 页。该信原文见普里查德编《关于马戛尔尼使团北京传教士的来函》，《通报》1934 年，第 31 卷，第 8－24 页。

(61)此事曾刊于 1803 年北京的邸报中。参见使团成员巴罗（Barrow）：《Travels in China》（《中国行记》），1806 年伦敦版，第 19－20 页。

(63)贺清泰在给马戛尔尼的信中甚至认为索德超对英国并非十分不友好，格拉蒙特的指责不过是妒忌而已。见《通报》1934 年，第 31 卷，第 40－43 页。